

软件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强国建设

扩大软件阵营、持续提高能力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当务之急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去年，中国软件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新阶段，规模快速提升，集聚效应日益显现，软件名城、名园的建设成为推动软件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少锋日前在2020中国软件产业年会上表示。近年来，全球软件市场形成了以美国、欧洲、印度、日本、中国等国为主的国际软件产业分工体系。与其他地区相比，2019年中国软件行业运行态势良好，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步伐加快。

记者了解到，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从2007年的580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6.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4.23%。2019年1月至11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合计达6.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8260亿元，同比增长11%。从业人员工资总额超7877亿元。

“如今，软件产业有力地支撑了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谢少锋表示，国内应用软件企业在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复杂电网调度和控制系统、物流仓储管理系统、轻量化平台等方面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云计算、智能语音、人工智能、开发框架等众多软件开发产品加速赶超世界一流水平，软件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1月19日刚刚发布的《2019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软件行业前百家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在软件技术、标准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出口市场不断向新兴市场拓展，对东南亚等国软件出口持续扩大，同比增长172%。与此同时，前百家企业坚持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推进在海外的本地化经营，有31家企业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分公司或研发中心。

优化营商环境 山西进入法治化轨道

本报讯 1月19日上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山西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简要介绍时称，条例对“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作出明确规定。

据悉，条例共七章59条，主要从优化审批、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和法治保障五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进转型综改的重要突破口，先后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着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和数字政府建设。”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建平介绍称，条例将这些重要举措，如数字政府建设的“五个一”工程，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等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事关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高质量发展。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变，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条例详细规定了“一朵云”“一张网”“一平台”“一系统”和“一城墙”在山西省实施的具体要求。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赵建平说，条例有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推动山西省营商环境加快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据了解，条例将从3月1日起正式实施。(吴银冰)

中国出口商品品牌评价



中国贸促会

更多精彩前往
chinatradenews.com.cn



邮箱
baoshe@ccpit.org

与会人士称，软件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营造的良好外部环境。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从投融资体制、税收、产业技术、软件出口、收入分配、人才吸引与培养、知识产权保护、行业组织与管理等多方面为软件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扶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家广表示，软件是信息技术之魂，经济转型之擎、网络安全之盾、数字社会之基、大国博弈之焦，高质量发展的抓手，软件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日益明显。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表示，目前，软件和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已经进入数智化阶段，由帮助企业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变为实现商业创新，构建发展和竞争优势。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CEO刘积仁也表示，软件正在成为商业的载体，任何一个商业都需要软件，软件可以充分利用和创造新的资源来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今天的软件已经不是技术，是一个互联，是经济，是生活，也是实体。”

特别是在工业领域，软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控科技集团创始人褚健表示，工业4.0是由软件驱动的工业革命，要想数百万制造企业都能享受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好处，需要把所有的生产过程、参数、设备连接起来，同时还要有大量的应用和软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廖湘科表示，工业软件要向建设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控制管理整个生产模式的基础软件平台发展。褚健以智能手机举例，手机的智能化源于安卓商店、苹果商店，没有这些商店里的APP，智能手机就无从谈起。智能工厂与智能手机类似，如果有一个类似于安卓、苹果的操作系统，把工厂里面所有的数据，比如



1月17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的通知》，将石家庄等50个城市(地区)及海南全岛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相关城市和地区可按照2018年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商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图为消费者在北京一家超市选购进口商品。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摄

汽车品牌出口呈现头部企业集中趋势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实习记者 刘若然

1月15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2019年前十家汽车生产企业出口量排名》。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出口量位居前十位的汽车生产企业依次为：上汽、奇瑞、东风、北汽、长安、长城、吉利、江淮、大庆沃尔沃和重汽，分别出口28.5万辆、9.6万辆、8.6万辆、8万辆、6.8万辆、6.5万辆、5.8万辆、4.5万辆、4.4万辆和4万辆。与2018年相比，奇瑞、江淮和大庆沃尔沃出口量呈较快下降，其他企业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吉利、长城和上汽增速明显。上述十家企业共出口86.7万辆，占我国汽车企业出口总量的84.6%。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郭晓蓓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2019年汽车出口排名前十的企业呈现出明显的两级梯队，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是近些年来随着汽车行业体量增长，市场存量明显；加之汽车行业利润增幅低于营收增幅的趋势发展，企业盈利能力普遍减弱，这使得边缘企业压力陡增；而来自于制造端的压力已传导至各个环节。在此背景下，中国汽车行业“马太效应”更为显现，汽车出口呈现出向头部集中的发展趋势。

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月13日发布的《2019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去年我国汽车出口102.4万辆，同比下降1.6%。其中乘用车出口72.5万辆，商用车出口29.9万辆。与商用车出口略有增长

不同，我国乘用车出口显现小幅下降。尽管如此，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依然继续蝉联全球第一，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由于行业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之中，加之中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与上年相比依然未减。

郭晓蓓认为，2019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呈现小幅下滑趋势，一方面是由于2019年汽车行业出口受美国市场和政策变化的冲击较大；另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市场出口增速较快，给中国汽车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但是，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扩进口 优环境 共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均有不同，经贸合作互补性较强。美国在能源、制成品、农产品、医疗、金融等领域具备优质供给能力，扩大自美进口，有利于满足我国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孟玮说，加强中美经贸合作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推动产品和服务提质升级。中美两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将遵循世贸组织规则，根据市场化原则，与美国企业商谈进口协议，扩大自美商品和服务进口。

此外，自今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施行，孟玮对此表示，“一法一条例”将为我国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她进一步介绍，从“一法一条例”的核心要义来看，可以用“开放、公平、便利”六个字概括。

关于开放，外商投资法明确将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写入法律，以法律法规来推进制度型开放，保障开放措施得到有效实施。实践中，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连续3年进行修订，清单长度由93条减至40条，在金融、汽车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下一步，2020年我国将继续推动负面清单修订，将继续按照

“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加大自贸试验区开放试点力度。

关于公平，贯彻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理念，以法律法规确定了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享有与内资企业同等待遇，营造了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步，在“一法一条例”落实过程中，要执行好法律法规确定的有关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制度，特别是在企业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标准制定，行政审批等方面，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得对外资设置单独的准入限制。

关于便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法律法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做好外商投资服务，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等可依法自由汇入汇出。改革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取消了外资企业设立审批、备案。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为契机，结合投资领域“堵点”梳理，充分考虑外资项目特点，继续完善相关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持。“特斯拉上海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的缩影，我们相信随着各地更加重视服务，更加优化营商环境，企业投资会更加便利。”孟玮说。

阖家团圆日 3000万人将独自出游

本报讯 (记者 刘禹松) 1月20日，《中国贸易报》记者从携程网获悉，根据该平台发布的春节出行预测报告，今年春节将会有4.5亿人次旅游过年。据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走亲访友，而选择在假期用旅游来充实自己，哪怕独自一人。根据调查显示，至少四分之一的网友在今年春节有出行计划，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则显示，春节出游者中有7%的游客都是独自一人出行。携程以此推测，预计单身出游者将达3000万人次。

携程网的数据显示，在境外目的地的选择上，日本、泰国、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意大利、英国、俄罗斯是春节期间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热门。这些国家旅游路线成熟，体系完善，可以为独自一人的游客在出游的过

程中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单身旅游”的新潮流，携程开发了新跟团、自由行、定制游、当地向导产品，满足年轻人一个人旅行的需求。根据携程数据，在产品形态的选择上，63%的游客选择了自由行，其次是跟团游，占比达到37%。据了解，单身出游的游客更愿意通过自由行的方式来给予自己的行程更高的自由度，通过网上选择自由行产品，再对航班、酒店进行组合，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作为单身出游的另一种选择，目的地参团、私家团、高钻跟团游也都预订火爆。对于年轻人而言，参加旅行团可以结交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游览风光的同时甚至有机会在旅途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加强伊斯兰金融合作 促一带一路多方共赢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人口数量约为18亿，占全球穆斯林人口数量的70%；沿线一半以上的国家，穆斯林人口数量超过全国总人数的50%。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推动伊斯兰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正在成为更多国家间的共识。”近日，中国伊斯兰金融俱乐部CEO黄雷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斯兰金融当前正在全球飞速发展，旺盛的生命力使其有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黄雷告诉记者，伊斯兰金融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遵循伊斯兰教义的资金融通活动。其宗旨是面向企业，为社会创造共同价值。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伊斯兰金融的原则背书，并将其行为纳入监管项目。该组织认为，伊斯兰金融原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此举也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伊斯兰金融

行业重要性的认可。

据黄雷介绍，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伊斯兰金融正呈现出“去宗教化”的发展趋势。在许多非穆斯林国家，伊斯兰金融被称之为替代金融、责任金融、道德金融等，而在阿联酋、摩洛哥等伊斯兰国家，则被称之为参与金融。

黄雷表示，地处海湾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依托巨大的石油资源储备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和主权基金，但由于这一地区投资容量不大，使得他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全球。传统上，这些投资60%集中在美国，30%在欧洲，其余在亚洲。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伊斯兰投资者逐步将资产转移到相对稳定、回报较高的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建设新能源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发展航空运输业等，既符合伊斯兰金融体系对长期的、低风险、稳定收益项目的投资偏好，同时也符合伊斯兰国家实现其

金融体系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

黄雷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间合作不断落实，与建设项目配套的伊斯兰融资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目前，中国也正加快伊斯兰金融建设的相关发展，通过打造伊斯兰金融项目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向前推进。今年1月7日，由中国—阿联酋伊斯兰金融论坛升级而来的第四届中国—阿联酋经贸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上，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与成都高新区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合作备忘录。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关系的建立将促进双方在园区间国际合作、企业间联系、多元金融与贸易创新服务等方面强强联合，为双方园区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动力。

据了解，中国—阿联酋经贸论坛由中国伊斯兰金融俱乐部、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哈姆丹·本·穆罕默

德智慧大学等机构在2016年联合发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部在2018年加入主办，影响力不断提升。“伊斯兰金融产品丰富、形式多样。如能作为工具，将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黄雷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海湾地区伊斯兰资本对于在中国市场的落地和发展抱有极大兴趣和积极态度，但不同语言、宗教、法律、文化造成的差异又极大限制了伊斯兰金融在中国发展。因此，通过建立“智库”，提供顶层设计、跨文化服务与落地中国的实际解决方案，搭建高效项目对接资源平台，已经成为时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同时，伊斯兰金融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好发展、激发市场需求，也需要在国内银行业、证券业、基金业、投资业、实体业等领域被更多专业人士所认知。黄雷说，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开始关注来

自中东地区的资本。而相关中资企业如果在阿联酋的迪拜设立代表处，不但可以更好的与投资者建立紧密联系，而且能够利用当地先进、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从中东、北非等地区获取更多流动资金。此外，黄雷还认为，广泛参与伊斯兰金融国际会议，深入参与全球伊斯兰金融建设，建设相关人才库，培养专业伊斯兰金融人才等也是未来中国用好伊斯兰金融工具的重要保障。

“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伊斯兰金融越来越积极地参与非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业务，其必将成为中国企业拓展中东等人口快速增长地区，投资贸易业务的市场利器。同时伊斯兰金融也是中国进入‘一带一路’沿线最大资金池的快捷通道，能够快速对接资源，稳步实现目标，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助力。”黄雷说。